

文史知识

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谈到近代

「纯学术」的考证学

谈谈我国的四大民间传说

晋武帝统一中国

国·天下·国号

天安门的设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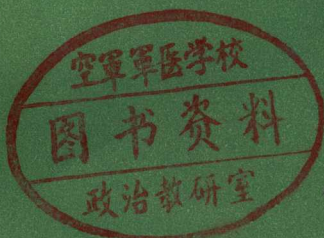
杨公骥

程 普

祝总斌

史苏苑

朱光亚



1985

WENSHI

ZHISHI

5



《葛稚川移居图》
〔元〕王蒙



（参阅本期《谈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一文》）



医药学院610 2 01495682

文史知识

1985年第5期

(总第47期)

·治学之道·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水壶谈到

近代“纯学术”的考证学

杨公骥 3

·文学史百题·谈谈我国的四大民间传说

程 菁 8

·历史百题·晋武帝统一全国

祝总斌 14

·怎样读·宋玉和他的《九辩》

袁 梅 20

知人论文 具体分析

诗
文
欣
赏

——谈谈怎样分析古代散文

倪其心 27

一篇善鸣不平的妙文——读韩愈《进学解》

方智范 34

谈朱敦儒的《相见欢》

陆永品 37

李逵的喜剧性格及其美学意义

——谈元杂剧《李逵负荆》

孙建国 39

·古文字学十二讲·

第七讲 战国文字研究

李学勤 44

·文史工具书介绍·

《贩书偶记》及其《续编》

雷梦水 48

·文史书目答问·

《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

马 冰 51

文化 国·天下·国号

史苏苑 54

史 汉代的角抵百戏

孙景琛 60

知识 中国古建筑中的廊(庑、副阶)

罗哲文 65

• 词学名词解释(10) •

减字偷声

施蛰存 70

人
物
春
秋

思想家而兼文学家的荀子

郑君华 73

谏臣魏征

邓 堪 77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吴文治 82

辨帅张勋

王致中 89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十六) •

两晋职官

孙 铨 95

-
- 文史信息 • 考古新发现与夏商文化研究(106) 如何评价王安
石变法(106) 戴逸同志谈左宗棠评价问题(107)
“女嫫”究竟是什么人(107)

成语

芒刺在背

齐 玖 108

典故

鹤立鸡群

司马驰 109

青
年
园
地

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讨论 吉林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 100

也缘批讽也缘情(于长洪 刘光牛) 应识深情“长恨”中(霍

巨燃 李雪竹) 此恨绵绵何由得(李玉鹏 姚文辉)

-
- 书画欣赏 • 谈王蒙《葛稚川移居图》

聂崇正 110

-
- 文史信箱 • 天安门的设计者

朱光亚 112

-
- 文史研究动态 • 《文赋》研究综述

李庆甲 122

北京大学1985年研究生入学试题及答案(历史系综合试题)

-
- 补白 9 则 • 陈执中不予婿官(13) 封泥(26) 窦诞免官(33)
掉书袋的故事(64) 青盲(72) 赵枢强记不矜(81) 赏及
无功(94) 郭偃论治国之难(111) 陈子昂初入京(115)

封面设计 张守义

《葛稚川移居图》元 王蒙(封二) 中国古建筑中的廊(封三)

从牛顿的苹果、瓦特的 水壶谈到近代“纯学术” 的考证学

杨 公 骥



杨公骥，河北省正定县人，生于1921年。1937年在中华大学学习，1938年参加革命，1946年任东北大学（今名东北师范大学）教授，1981年任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等。

据传说，牛顿儿童时，看见苹果熟透后垂直地坠落到地面上，由此便受到启发，经过长期研究，终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又传说，瓦特少年时，看见壶水沸腾后热汽顶开了壶盖，由此便得到启发，经过长年设计，终于发明了蒸汽机。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科学趣闻。但是，假如有哪位物理学家不是据此去探索或研究万有引力定律和蒸汽发动机原理，却深入细致地去考证牛顿所见到的那棵苹果树究竟是谁栽种的？那个苹果到底是青苹果还是红苹果？那个苹果最终被谁吃了？瓦特所使用的那把水壶是铜水壶？铁水壶？还是锡水壶？它是花几先令几便士由伦敦哪家店铺里买来的？人们听了是会发笑的。这倒不是说这些问题不深奥，研究起来不艰难，相反，这都是些不易弄清的“尖端”难题。因为，日居月诸，文献不足，由他百家争鸣，也难考证清楚。当然，有道是“学海无涯苦做舟”，如果肯苦学狠钻，耐心搜集和考求材料，那么，制造出个把创见倒也并非难事。譬如，说瓦特的那把水壶是铜的固然是创见，说是铁的当然也是创见，而说是锡的又何尝不是创见？苦心孤诣，戛戛独造，各成一家之言。但是，即使把牛顿的苹果或瓦特的水壶考证入微，搞深搞透，那也无助于认识引

力定律和热机原理。因为它和自然科学、物理学毫不相干。

这样说，自然是假设之言，但并不完全是开玩笑。在西方确有如此的研究方法，有这样的考证学派。圣玛利亚是不是处女？荷马是否确有其人？他是不是个双眼瞎？苏格拉底和他的青年弟子间有无“渎神行为”？拜伦是不是梅毒病患者？那又是怎么感染的？莎士比亚是否真有其人？还是培根或哪位男爵的化名？莫里哀与其妙龄妻子间有无血统关系？歌德的风流韵事究竟有多少？王尔德的案情到底如何？不止如此，还相牵连地考证起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如：吉河德先生的“原型”是谁？他的行状怎样？包法利太太“真人”的娘家妈是谁？她的家境如何？举凡此类问题，学者们谈起来津津有味，写出来洋洋大观，或据此著书立说，或因此成家称派，或博来学位，或赢得奖金。

当然，这虽然都是些微末细事，但有的学者却擅于小题而大作，依据其考证出来的微末琐事能创造出宏文大论。譬如，有的学者根据拿破仑一世小肚皮上的一块牛皮癣，来证明它是如何决定了欧洲历史的进程。其推论是：查拿破仑陛下小肚子上生着一块顽癣，考证属实，可作前提；据当时法兰西的国情，癣之为病很不高雅，它只是在“卑贱”的贫民或士兵中才流行的常见病；因此这块“御癣”受到了拿破仑的新婚妻子、高贵的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的蔑视（属于心理的）和憎恶（属于肉体的）；于是拿破仑在尊贵而美丽的爱人面前不由得自惭形秽，羞愧欲死；据心理学指示，自卑常转为自大，老羞易转成怒。所以在这种“情结”支配之下，便激起了拿破仑军事冒险的野心，于是便亲率近卫主力军千里迢迢去揍俄罗斯人，企图建立盖世之功以雪肚皮之耻，借此作为代偿以换得娇妻的青睐与敬意。但作为对手的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却是个老不正经，喜欢偷鸡摸狗，因此在政界中舆论很坏，宸衷也为之不喜；这使得库将军精神包袱很重，所以打起仗来，胆小持重，力求万全，一再退避，结果却把拿破仑六十万大军拖垮了，几乎是全面覆没。这么一来，不仅促使法兰西第一帝国垮台，而且引起欧洲各国政局为之改观，同时也激发了俄国的政治改革，民主思想乘机兴起，既出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也出现了普希金的诗篇和赫尔岑的论著。如此这般考来考去所得出的结论是：拿皇

帝小肚子上虽然患的是“癣疥小疾”，但它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大变局。如拿破仑肚皮上没有这肮脏的癣，则天下事未可知！

如用这种考据学来搞文学史，则更容易“创造”新见解，形成“突破”。例如，经西方学者精心考证，证实巴尔扎克乃是个赌鬼和财迷，投资有瘾，赌博成癖。不过，他既不善于经营，赌技又很不高明，于是输了个精光，还欠了一身债，穷得连老婆都娶不起，只好找一位超龄的老太太谈谈情说说爱。由于债务如山，债主成群，逼债如火，所以逼得巴尔扎克为清偿积欠，便不得不在黑咖啡的刺激下衣旰食宵、夜以继日地拚命写小说。结果呢？结果是逼得巴尔扎克在二十年间竟写出了九十多部长篇小说。结论便是：逼债既能逼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又能逼出“现实主义文学”来。设或巴尔扎克在赌场上不是输家，而是赢家，则法国文学史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当然，依据如此小小的“实证”，推演出这般大的“结论”，也只有大学者才能为之。至于一般学者，则只会“纯学术”地在材料上下功夫，或考证古人之隐私，或考索文坛之佳话。其用场不外是，或作为茶余饭后的谈助，或作为“余兴”点缀报刊，或作为课堂上的“抗眠剂”用来兴奋一下大学生们的脑神经。当然，在学术论文中，也可以把这些考证出来的奇闻趣事作为增彩生光的点睛之笔，或用作震动全局的原子之弹。

如认为这种烦琐考证只是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或生活癖好，却又不尽然。这种“考据学”往往是以实用主义、实证哲学、存在主义、行为主义和“心理分析学派”等等学说为依据的，或是这些学说的治学方法的不自觉地表现。晚近，这些学者又从原子物理学中寻到了对自己适合的理由，认为：正如微观粒子构成宏观世界，微为巨始，大由小成，同样，认为“存在”着的个人微念、细行和潜意识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存在和历史事件的始基。这样，不仅考证学，甚至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也往往冠以“微观”牌号。但殊不知这些学派和这样考证方法倒是属于旧学派和老方法。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说过：“大家知道，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琐碎的理由来解释伟大的事情。”可知，此方法古已有之。当然，今天其考证方法比过去精细得多——它在使

用电子计算机。

以上，我说的是西方。不是指我国今天的学术界。

但是，早在三十年代，我国一些学者也曾受到过这一学风的影响。记得有位学者曾使用这学派的考证方法，考查过墨子的国籍。其论证是据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氏兼爱，是无父也”，经过训诂、考证、推论之后，结论是：“墨”者，即墨面，黑脸孔也；“翟”通“狄”，“狄”者，乃对外国人之通称；故“墨翟”者，其义为黑脸外国人，实为印度人。再考：“摩顶”即和尚受剃度后之戒体（秃头）；“放踵”乃是比丘行脚时的法相（赤脚）；“兼爱”义为大慈大悲；“利天下为之”义为普渡众生；“无父”则是指佛家戒律“出家人不拜父母”而言。由此考证出墨子是印度人，而且是位印度的佛教和尚。此外，有人还考证出黄帝是古巴比伦国王。不过这涉及到楔形文字和古汉语对音，其说艰深，难以复述。

至于有关文学史的“纯学术”考证，则纷纷然更多。诸如：陶渊明有几位爱人？杜甫究竟是被黄牛肉还是被水牛肉撑死的？白居易的妈闺名叫啥？她是怎么死的？曹雪芹的烹饪技术如何？他会不会糊风筝？大观园到底在哪里？薛宝钗常服的冷香丸是由哪几味药材配方？鲁迅爱不爱吃冰糖葫芦？齐天大圣孙猴子的根据地花果山究竟坐落在哪一省？是江苏？陕西？抑或甘肃？等等。可以说，钩沉稽佚，发隐抉微，支节蔓生，新说蜂起，热闹一时。但就其方法论而言，它和考证牛顿的苹果或瓦特的水壶同属一家风。

任何一种科学研究，如果离开其自身的性质、特点和范畴，就会失去科学意义。

其次，就实质而言，这种所谓“纯学术”的考证，其低者无非是搜集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古代“小道消息”，其高者也不过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严格说来，还都算不上是科学研究。因为，文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对文学实践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规律的探讨，而不是依靠文献材料的整理和微言琐事的考证。整理与考证只不过是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起码手段，不能用它来代替科学研究本身。

当然，依靠这种“纯学术”的考证是无助于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

需说明，我毫无轻视搜集材料或反对考证材料之意。据我所知，马克思主义比任何其他学派都更重视对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即调查、研究）。马克思曾自言，他为了研究“商品经济体系”这一问题，“搜集丰富材料”，而且不断“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甚至对“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上”的材料，也进行了搜集与研究。马克思“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功夫来研究这些材料”，不仅对这些材料细心地审核和考证，而且深入地进行具体分析，联系地进行比较综合，之后才从中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由此可知，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会“务虚”，只会讲抽象的大道理，而不从事具体的考证，不讲求“考证学”的看法，或是出于误解，或是出于无知。

众所熟知，马克思主义的治学方法“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这就是说，不是从什么“先验的”概念出发，而是从反映事实的材料出发。所以，在研究时首先必须巨细无遗地占有第一手的全面材料，进而必须严格地考证材料，辨其真伪；细心地审度材料，别其主从；比较地研究材料，判断其本质性和现象性。但更重要的不是停止在对材料的整理和考证上，而是要在庞多杂乱的材料之间发现其客观的内在联系，从联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所谓从材料间的客观内在联系中研究问题，意思就是不以自己的主观假设作为联系材料的针线，不把自己的主观臆断当成摆布材料的格局。否则，就会把拿破仑肚皮上癣之有无与第一帝国的兴亡、巴黎赌场上的输赢与《人间喜剧》之能否出现作为前因后果而联系起来。

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从来不轻视对材料的考证，相反，它的考证法比任何其他学派都要认真，都要严肃。因为，对学术研究说来，无证不立，孤证不信，作为论据的材料如果不信实、不准确，则由此推论出来的论点必然会失误。所以，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从考证研究材料入手。当然，所谓“考证”不同于猎奇，所谓“研究”不同于小市民摆龙门阵。事实是，考证作为研究手段各学派是相同的，但各有各的逻辑方法，各有各的研究目的。区别就在于此。

谈谈我国的四大民间传说

程 蔷

一 “四大传说”的名称、内容及其特征

历史悠久的中华古国，民间文学的宝藏十分丰富。其中仅民间传说这一门类，便包含着无数奇珍异宝，令人有美不胜收之感。在这些传说中，《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其流传年代的久远、流传地域的广泛和影响的巨大，而被并称为我国的“四大传说”。

这四部作品就其主要情节而言，都可以说是优美的、带有浓郁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牛郎织女》的传说，显然脱胎于古代神话。隔在银河两岸的牵牛星、织女星在传说中被说成是因为追求自由爱情而受罚的一对苦命夫妻。他们每晚隔河相望，盼着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这则传说既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里男耕女织和爱情受压制等现实，同时也是对大自然中星辰现象的一种使人动情的解释。《白蛇传》的传说讲了一个人妖结合的故事。传说中的白娘子是一个蛇妖，但又不是一般人心目中害人吃人的“妖精”。她不但

美丽善良，向往人间的爱情；而且勇敢热情，主动追求自己钟情的男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坚贞刚强，敢于同破坏其幸福生活的恶势力进行殊死斗争。因此千百年来，她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和钦佩。《孟姜女》的传说把一对夫妻生离死别的悲剧，置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的背景下，以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哭倒长城的情节，控诉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奴役。《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爱情传说，男女主人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的爱情要求，而最后的婚变和殉情则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礼教对他们的迫害。由于它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一种纯真美丽的爱情的毁灭，它的感染力和

对压迫者的鞭挞力量是很强的。

除了情节与爱情有关、结局具有悲剧意味这两点为“四大传说”所共有外，它们还有其他一些共同之处，择其要者而言，有以下数端：

首先，它们都是民间集体创作。这些作品不是哪一位作者独立写成的，而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无数的故事讲述者、搜集记录者、说书人、文人、戏曲家等的增删、修饰、润色，甚至改编或再创作，才形成今天这个模样的。创作者的集体性和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性本是民间文学的一般特征。这个特征在“四大传说”身上表现得也很突出，所以需要特别提出。

其次，它们随着各自流传地域的不同而分别带有特定的地方色彩。换言之，就是在故事基本情节不变的前提下，表现出与各地风土人情相结合的趋势。例如《白蛇传》中关于白娘子与法海的出生地点及缘由，各地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四川一带说是白娘子出于峨眉山白龙洞，法海出于峨眉山中的蛤蟆洞；江浙一带则把他们的出世安排在镇江金山寺；而湖北、江西又把他们的来源与武当山联系起来。又如流传于河北、北京一带的《孟姜女》传说，说孟姜女是八达岭人，并有姜女庙为证。可是，同名的姜女庙不但河北有，全国各地还能找到不少，如湖南澧县就有，所以湖南也就成了孟姜女的家乡。陕西的孟姜女传说则说她是铜川孟家塘人；而到了江浙一带，孟姜女又成了一个南方人。在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把孟姜女涂上了更多的少数民族少女的特色。如毛难族的传说中，孟姜女是个“种山人”，还是个好歌手。她与范喜良相遇，便以情歌来表达相互的爱慕之心。这无疑是《孟姜女》传说与该地民间习俗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情况在《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中同样存在，遍布于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梁祝墓和庙，就是一个明证。

由于以上两个特点必然引出另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这“四大传说”虽然名传遐迩，但却始终没有一个可靠的文字定本，至今它们仍然可以成为各地、各种文艺样式进行再创作的依据。

再次，“四大传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共同特点，即它们都带有相当的传奇性。就实质而言，它们的内容是扎根于社会现实

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的。但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们又具备超现实、超人间的因素。既是天上星宿，又是人间男女；前世蛇精，化为现世的女子；哭声震倒万里长城；生前不能结合，死后化蝶双飞；等等，当然都不可能是现实中真有的事。但若没有这些，也就没有了我们熟悉的“四大传说”，也就没有了“四大传说”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需要说明的是，“四大传说”都包含传奇因素，但来源与成因却不尽相同。例如“牛郎织女”故事中的传奇性主要来源于古代神话，是古人对自然界幻想的残留。而《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传奇性却纯系浪漫主义手法，是近代人的一种艺术创造。

二、“四大传说”的历史渊源

同一切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一样，“四大传说”也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反复锤炼才成为艺术精品的。

“四大传说”的形成是在中国社会的封建阶段，但其源头却要古老得多。《牛郎织女》、《白蛇传》两则传说都与古代神话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前面已经提到，《牛郎织女》传说与原始的日月星辰神话有关。《诗经·大东》篇即有“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的句子，譬喻银河两岸的星汉徒有织女、牵牛之名，却织不成有文采的织物，拉不了备着车厢的车子。这大概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这两颗星宿的最早记载。《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中，已出现了牛郎、织女隔河相望而不能交语的诗句。两星既呈人形，故事亦初具轮廓。到东汉应劭《风俗通》中，即出现了“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的记载。在这些零星材料的基础上，六朝梁殷芸《小说》（见明冯应京《月令广义》引）中乃出现基本成形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并且在差不多同时的《荆楚岁时记》里，这则传说已与民间每年七月七日“乞巧”的风俗发生了联系。

《白蛇传》中白娘子这个蛇精变幻而成的女性形象，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在她身上同样有着古神话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神话中，诸如女娲、伏羲、共工等都呈“人首蛇身”之形，可谓最早的“蛇神”。由此可

知,人形与蛇形共存于一体,实为古已有之的观念。当然,在古神话中的那些蛇神身上,这种共存现象是表面化的,是人形的一部分和蛇形的一部分机械地拼接为一体。而在《白蛇传》中,这种共存现象却表现为人形人性与蛇形蛇性的交融渗透,表现为在一定条件下蛇形和人形的互相变化,而不是人首与蛇身的拼接,这显然要比古神话中蛇神身上的“共存”更为复杂而深刻。但不可否认,后来的这种“共存”与古神话中的“共存”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而且古神话中的蛇神往往就是水神。它们之中有的是治水英雄(如女娲、大禹),有的是掀起洪水的水怪(如共工)。这一特点也为白娘子所继承。在《白蛇传》中,白娘子与“水”同样结有不解之缘。她会呼风唤雨,从而引出了“同舟”、“借伞”的情节。当她被恶势力迫害时,又调动水族来水漫金山。凡此种种,说明《白蛇传》与古代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明它是植根很深而渊源有自的。

《孟姜女》传说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与古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传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孟姜女就是《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记的杞梁之妻(有意思的是,杞梁与后来传说中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读音确乎相近)。从这段记载,我们只能知道杞梁战死后,她不接受齐侯的郊吊。然而到战国时《檀弓》(见今《小戴礼记》)已有了杞梁妻“迎其(指杞梁)柩于路而哭之哀”的记载。《孟姜女》传说中,“哭”是十分关键的情节,正是由于它,人们便在这一记载中找到了传说的源头。在《孟子·告子下》里面,杞梁妻已是“善哭其夫而变国俗”的著名人物。然而,到此为止,我们还不能说《孟姜女》传说已经形成,因为作为这个传说的主要内容尚未出现。只是到了西汉刘向的《说苑》和《列女传》中,才开始出现“杞梁妻哭夫,城为之崩”的说法,然后,一直到唐代《珮玉集》所采《同贤记》中,才进一步有了孟氏女仲姿与避筑城劳役而躲进孟家园中的杞梁成亲,后来杞梁死于长城役地,孟氏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在《敦煌曲子词》中也已出现孟姜女这一称呼,因此严格说来,《孟姜女》传说直到此时才算正式形成。

在“四大传说”中,相对说来《梁山伯与祝英台》起源较晚。初唐梁载言《十道四蕃志》中开始出现有关梁祝同冢的记载,而到晚唐张读

《宣室志》里面所记的梁祝传说，已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故事大体相似。

三、“四大传说”随时代发展而演变

“四大传说”从形成至今日，已过去了千百年时间，尽管时代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它们却仍然获得人们的喜爱。这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够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发生相应的演化。民间文学作品不象作家文学那样，一经写定就不再变动，而是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可以通过讲述、整理、改编等途径，对它有所添加、有所增删，把自己生活时代的社会现实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融注到旧有传说的躯壳中去，使它跟随时代而不断变化。“四大传说”之所以能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喜爱，关键就在于它们在这种演变之中获得了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以《白蛇传》为例，我们都知道，这个传说的魅力主要来自于它所塑造的强烈追求爱情和婚姻幸福，并与封建势力坚决斗争的白娘子这一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并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这样的思想高度的，她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经过无数人（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反复塑造而成，经过时代潮流的不断淘洗，才使她的这一本质特征放射出光采。在白蛇故事的雏型，如唐代《李黄》、宋代《西湖三塔记》中，白蛇还只是个以色相缠人、害人的妖精。明代冯梦龙以宋代话本为基础加工完成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小说。其中增入不少南宋以来的生活情景，抛弃了《李黄》、《西湖三塔记》中很浓重的妖精食人的观念，并已朦胧地流露出青年男女追求恋爱婚姻自由这种带有反封建意味的思想。但是，冯梦龙的小说基本上还是一个劝戒世人莫贪美色的故事，并没有彻底摆脱妖精害人的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这样的作品渐渐不能适应人民的要求。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反抗封建礼教的民主革命要求日益觉醒并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流之后，《白蛇传》也经过不断的演变而使其反封建主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接近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时候的白娘子已洗尽了妖气而理想化地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一切美德。解放以后，这个传说仍在演变和发展，据此传说改编的各

种戏曲，情节更加丰富、人物性格更加丰满，表现了更高的精神境界，因而也更符合今天广大劳动人民的口味。

《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三个传说也经历了与《白蛇传》大致相同的演变过程。如有些地区的《孟姜女》传说，自明清以来，秦始皇成了故事中直接出场的人物，孟姜女与秦始皇之间演出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从而使传说对最高统治者残暴本性的鞭挞更为有力。《孟姜女》从最初只是刻画一个遵守封建礼法、“善哭”的妇女形象发展成对封建统治者的血泪控诉，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艰巨的演变过程的。

总之，“四大传说”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思想和艺术境界不断向上、不断近代化的进程。长期以来，它们对我国的文学艺术，特别是曲艺、戏曲、通俗文学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至今日，它们仍在我国广大民间的口头、各种出版物中以及戏曲舞台上散发着自己特有的芳香。当然，由于社会情况是复杂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民间文学有所污染，而且，就是劳动人民的思想也并非毫无局限性，因此，“四大传说”正如一切民间文学作品一样，既有它光辉的一面，也有其不足之处。对于它们的两面，我们都应有充分的估计和认识。

陈执中不予婿官

陈恭公作相，有婿求差遣。恭公曰：“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篋之物，婿安得有之？”竟不与。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

【译文】陈执中（字昭誉，宋仁宗时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恭）做了宰相，他有个女婿请求给安排一个职位。执中说：“官职是国家的，不是我房间里的箱笼杂物，女婿怎么可以随便得到呢？”到底没有给他安排。

（金昆年）

晋武帝统一全国

祝 总 斌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的开国皇帝，史称其“宇量弘厚”、“明达善谋”。他继承父祖遗业，用曹丕禅汉的同样手法，将曹氏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还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封建地主阶级政治家。可是，长期以来评论者多着重在批判他晚年政事谬乱，种下“八王之乱”祸根的一面，而对他统一全国之功却往往估计不够，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立意伐吴 态度坚决

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人们要求统一，渴望和平。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割据势力林立，由于种种复杂原因，二、三十年后虽逐渐走向统一，却又长期停留于三国鼎立阶段。一直到晋武帝即位(265)前后，方才出现新的局面。263年，魏灭蜀，三国鼎立变成南北对峙。本来，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北方王朝力量已超过吴、蜀(如以人口计，当时魏约占全国七分之四，吴、蜀合在一起约占七分之二。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并吞蜀国后，力量对比更加悬殊。而且吴国孤危无援，境内不断发生叛乱，“天下皆谓吴当并亡”(《晋书·羊祜传》)。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便摆到晋武帝面前：敢不敢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晋武帝即位之初，废屯田，行分封，颁律令，奖励良吏，先忙于巩固刚刚从曹魏手中夺得的江山。统治越巩固，统一问题也就越突出。晋武帝雄心勃勃，很早便“密有灭吴之计”。然阻力很大，“腹心不同，公卿异议”(干宝《晋纪》总论)。只有羊祜、张华、杜预等几个人和他意见相合。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却认为：一、

吴有长江之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于取胜。二、从泰始六年(270)起，河西鲜卑树机能举兵反晋，先后有三个刺史败死，所以对吴国“兴军致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

对于这些困难，羊祜等人以为都可以设法克服，不足深虑；最关键的应是抓住吴主孙皓暴虐这一最有利的灭吴时机。孙皓即位于264年。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忍行酷刑，“或剥人面，或凿人眼”，“由是上下离心，莫为尽力”(《资治通鉴》卷80)。羊祜指出，乘此时刻出兵，“可不战而克”。如错过机会，“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晋书·羊祜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政治上、人心向背上观察问题，很有见地。

晋武帝赞许并根据这一观点和保守派展开了斗争。279年，他力排众议，下诏伐吴之时，贾充、荀勗等人拚命反对。晋武帝大怒，迫使“充免冠谢罪”。由于贾充本是晋武帝宠臣，作为三公，影响又很大，为了争取保守派，晋武帝仍委任他为伐吴诸军的元帅，给他以转圜、立功的机会。谁知贾充借机再次“固陈伐吴不利”；“自言老衰，不堪元帅之任”，拒绝任命，以此施加压力。这次晋武帝并未发火，而是很策略地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任元帅)”。贾充当然不敢恃宠狂妄到这个地步，只好受节钺，出镇襄阳(本段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卷80)。很明显，由于有了这次斗争，伐吴之役才得以展开。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春天，晋军虽攻下武昌(今湖北鄂城)，但因吴军主力尚未受创，且春水上涨，到夏天晋军又有可能发生疾疫，据此，保守派“皆以为未可轻进”，贾充上表请求班师，“以为后图”。因张华坚持继续进军，贾充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荀勗跟着奏请，“宜如充表”。这时晋武帝在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力下，毫不推卸责任，明确回答：“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拒绝退兵，从而再一次排除了干扰(本段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卷81)。这也正是晋武帝的可贵之处。试想，如果晋武帝态度不坚决，统一大业是很可能半途而废的。